

红尘悲音 *Tragedies in Human World*

History of World Modern Tragedy



世界近代悲剧史

谢柏梁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世界近代悲剧史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悲音·世界近代悲剧史/谢柏梁著 .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12
ISBN 7-104-01734-8

I . 世… II . 谢… III . 悲剧 - 戏剧史 - 世界 - 近代
IV . J8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006 号

红尘悲音·世界近代悲剧史

谢柏梁 著

监 制:艾 东
策 划:艾 东 沈 梅
责任编辑:韩慧强
责任校对:刘学青
责任印制:冯志强
装帧设计:龚伟民 郑 浩
责任发行:刘支京 沈德军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南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电 话:62110553 62127285
传 真:62127285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
印 刷:北京凯通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mm 1/16
字 数:830 千字
印 张:48
印 数:1 - 3 000 套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104-01734-8/J·763
定 价:80.00 元(全二册)
(本册:40.00 元)

《红尘悲音》总序

徐中玉

发表一篇论文相对容易，出版一本有些独创性质的著作殊大不易；出版一本著作相对容易，推出一整套系列丛书殊大不易。

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谢柏梁知难而进，常年在悲剧学领域内辛勤耕耘，终于推出了《红尘悲音》（《中外悲剧史论》）丛书。这套书包括《中国悲剧文学史》、《中国悲剧美学史》、《世界古典悲剧史》、《世界近代悲剧史》四本著作。

《中外悲剧史论》丛书面世之际，作者一定要我说几句话。柏梁是我十多年前的研究生，我对他本人以及这套书的情况所知较多，借此机会可以做些介绍。

柏梁在中外悲剧史、戏剧理论史和当代戏剧史方面，近些年已经出版了一些著作。有些书例如《世界悲剧文学史》出版后，较受读者欢迎，得到学界好评，曾经获得过全国优秀外国文学研究著作奖。现在谢柏梁将零星出版过的著作重新加以修改、增订和丰富，与尚未出版的同类著作集成起来，形成其悲剧学系列著作，一并在中国戏剧出版社、上海交大出版社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随园文库》出版，这对推动我国的中外悲剧史论研究，形成中国的悲剧学研究学派，都是大有裨益的基础铺垫过程。

柏梁出生在湖北天门市的一个书香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曾当过教师。天门古称竟陵，紧邻屈原任职的楚国都城郢都以及之后的荆州城。唐代茶圣陆羽、诗人皮日休和明代文学家钟惺、谭元春，都是竟陵人，所以这一带有着悠远的文化传

统。柏梁从小就养成了“敬惜字纸”、“开卷有益”的崇文心理，对知识、文化与学问抱有一种特殊尊爱的感情。

对传统价值观念和学术文化事业抱有终生信仰并非容易。这些年来，柏梁的不少同学都已跻身于老板、经理行列，经济收入颇为可观；从政的一些同学，也都有着较好的发展。他本人身处闹市长街中，依然能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坐得稳冷板凳，努力治学，殊为不易。

从读研究生时期起，柏梁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一些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近年来，他出版了好几部戏剧专门史，合起来看将可望构成自己的戏剧文化史系列。

我对于他的庞大计划，一则以喜，但也曾有过担忧。个人精力有限，不能太辛苦、太焦急。柏梁却能够劳逸结合，注意身心的调节和工作的节奏。他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下来，十多年来积少成多，写出了数本较有分量的戏剧专史和文学研究著作，这是很难得的劳作与成绩。

做学问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重在小处着眼，做微观的探究；另一种重在大处着眼，做宏观的把握。柏梁显然偏向于后一种，所做的都是一些中型规模的专门题目。这些题目有其独创性，具备一定的开拓意义；同时也应有微观探究作基础，因而颇具备难度，分外艰辛。大凡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拓荒者先行一步，后来者才能日臻完善。前者与后者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学术扎实、事业兴旺。拓荒者的精神很可贵。

当今社会安定、科研基金稳定，都是支撑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上对做出了一定成绩的青年学者，完全可能进行热心而有成效的扶植。柏梁也善于争取社会的支持，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得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曙光工程基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青年教师基金尤其是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基金等方面的资助。天道酬勤，社会各方面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希望他加倍精进，取得成绩。

大家的支持对柏梁既是动力，亦是压力。好在柏梁从小生活艰苦，初中毕业就失学6年。这期间当过农民，做过码头工，在生活的底层养成了顽强的毅力。他通过刻苦自学，连续考了三年大学，这才得以走进高等学府深造十年。艰难困苦，玉汝其成。柏梁能够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绩，按时完成各级科研资助部门下达的研究计划，并将研究成果在京、沪、台等地的出版社付梓行世，这都与他在少年时代形成的敢于吃苦的精神密不可分。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社会的支持与柏梁本人一以贯之的勤奋努力，使得

他30多岁就获得高级职称，成为较为年轻的教授，决不仅仅是偶然的机遇。他后来又被评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得了国家的一些荣誉和奖掖。1999年，他应美国学术基金会之邀，到好几所知名大学讲学。翌年回来后，他又被南京师范大学聘为全国中文学科的首批特聘教授。之后，他又被上海交通大学聘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比较文学方向的学术带头人。

据我所知，谢柏梁在《红尘悲音》（《中外悲剧史论》）丛书四种之外，还将另外推出《戏海文澜》丛书六种。后者包括《戏剧艺术探胜》、《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中华戏曲文化学》、《中国古代戏曲序跋汇辑》、《中华经典诗词曲》、《走近中国艺术大师》。

正是在南京师大、上海交大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多方面的支持下，柏梁才得以出版他的《红尘悲音》（《中外悲剧史论》）和《戏海文澜》两类丛书。这是他到目前为止，在求学问道、著书立说过程中所做出的最为重大的学术事业。我曾是他的导师，理应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也深感欣慰。

—

1983年，柏梁应考我和齐森华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当年的考生比较多，学养都不错，我给他们出的试题有一定难度，期待他们的起点较高、视野较广，同时也能看出他们的学术基础、悟解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记得有一道题目的大意是问：“中国古代文论有何特点，中西文论如何进行比较，古文论应该怎样发扬光大？”这一题目较大，可能看出考生的有关史论常识、知识储备情况、思辩训练情况以及宏观分析水平。柏梁回答得不错。连他在内，这一届择优录取了三名研究生。另外两位是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的谭帆和陆炜。他们分别来自湖北、上海和南京，碰巧都对戏剧理论比较感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交流，他们三人都决定在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化的大背景下，重点研究古代戏曲理论的发展过程。

我自己对曲论并无专门研究，只能同他们一起就研究的目的、方法与程序等最基本的方面入手，要求他们在积累并占有相当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具有关于中国曲论的基本观念。我们共同精读、讨论了若干古今理论名著，各自明确了自己准备主攻的课题，然后便要求尽可能从最重要的创作和研究专著中去大量搜集资料，并用原文复印、卡片制作和笔记抄录等方式日积月累，逐步拥有具备自己特色而又较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一边是材料的积累，一边是观念的拓展。我们用定期集会、共同讨论的方式，就各自最近接触、思考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以使自己的认识思路明晰起来。他们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共同讨论、相互补充。我也是参加讨论的一分子，在参与他们讨论的过程中亦增加了不少知识。我主张经过讨论，大家尽可保留各自的意见；只要言之有据、论之成理，就可以写到以后的硕士论文中去，完全不必受我发言的约束。

就这样，柏梁他们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每隔两个礼拜就要来到我的书房切磋半天，互通学习情况。三人中，柏梁年龄稍小，写东西很快，文字比较活泼，也勇于发言。由于他没有读过高中，又有一段黄金时间是在社会上务农做工，后来仓促读完大学本科，按说底子并不厚。但他有着较强的悟性，反应敏捷、思维活跃，又非常勤奋于习作，所以进步相当快。

针对其具体情况，我要求柏梁多积累资料，先把基础打扎实；除了规定应写的学习报告外，暂时不要写杂七杂八的其他文章，以免分散精力。在上课时，我介绍了自己求学时如何接受老师的指导，得以积累下几万张古代文论研究资料卡片的方法与体会，告诉他们下苦功是极其必要的。柏梁至少有两年之久泡在图书馆积累资料，同时也积极参加了我所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的部分工作。我还给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以及其他熟识的师友们写信，介绍柏梁分别到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藏书较丰的地方去查阅珍本、扩大视野。柏梁就这样成年累月地在京沪等地的图书馆查书、看书、抄书，较为完整地誊录了大量古代戏曲序跋，并写成了一部《中国古代戏曲序跋汇释》。硕士论文就用《中国古代戏曲序跋概论》的题目写成。由于资料掌握得比较多，辨析力也提高较快，学位论文写得相当丰厚。他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较早地论述到戏曲序跋中所蕴涵的大量文论资料及其意义。

戏曲序跋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只是一个个案。柏梁由此出发，亲身经历了学术研究，从选择课题出发经过广泛深入的第一手材料的占有，以后才能站在高处予以立论这一基本程序。只有经过了搜集材料阶段的艰苦，才能获得后期可能感到的明白酣畅。他后来广泛涉足于戏剧理论、当代戏剧、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等不同领域，都是这样起步的。

柏梁在华东师范大学主要学习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和戏曲理论。对文论曲论有一定了解后，很自然就会与文学史和戏曲史的具体创作联系起来看问题，这正是我一直提倡的研究方法。当我了解到柏梁有志于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戏曲发展的历

史，就推荐他到与我有师友深谊的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那里去攻读中国戏曲史博士学位，这一去又是三年。在这三年里，他又得到了各方面更多帮助。取得博士学位后，柏梁对我谈过他在中国悲剧史方面的许多见解，很有新意。他亦谈到，这些年就案头戏剧论中国戏剧、就中国戏曲论中国文化，还存在着与舞台演出相隔甚远、与话剧电影和西方文艺隔膜较多的一些困难。这方面的各种条件，可能在上海更方便一些。我就向上海戏剧学院介绍了柏梁的情况，很高兴得到学院支持，于是他又回到上海来了。

上海戏剧学院多年来一直以讲授、研究并上演世界各国经典名剧为特色，在国内外的演艺界夙著声望。在经历了湖北师院、华东师大和中山大学三个中文系不同情况的学习后，柏梁又得以在专门的戏剧学院担任具体教学工作，得到许多观摩实践的机会，了解舞台演出的全过程，对西方戏剧有了更多的学习和借鉴的可能。戏剧学院在中外戏剧影视方面有着集中而丰厚的书报杂志和音像资料，具备长年排练并演出西方戏剧的艺术氛围。柏梁过去一直是从案头文献方面对中国戏剧进行平面研究，现在有机会从场面上演出方面对戏剧呈现的全过程予以立体把握，能够将文学层面与艺术层面叠映起来看待，更有可能将较为纯粹的中国戏曲研究扩展到对西方戏剧的比较研究上去。

国际戏剧界与戏剧学院的多方面联系，同样给柏梁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视野。学院曾派柏梁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的几所名校讲授中国戏曲，使他得到了与北美戏剧界专家们当面切磋、互通讯息的便利，更具备了查阅有关西方悲剧学发展之文献资讯的基本条件。柏梁还曾应澳门基金会的邀请，到澳门大学讲学并查阅欧洲戏剧特别是南欧戏剧方面的文献。他之所以能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外国戏剧名家名著的范畴中去，这与他在域外学术界的见闻也大有关系。

正因为柏梁有着上述这样一些游学、治学较为优越的具体条件，加上他个人的很大努力和特别勤奋，才写出了《世界古典悲剧史》、《世界近代悲剧史》这样的著作。我一直赞成求学、治学和讲学要有适当的流动性，目前较为普遍存在着的学术界近亲繁殖的现象，恐怕还是有着某些弊端的。杜甫所说“转益多师是汝师”的求学方法值得重视。柏梁面前的学术之路还很长，还应谦虚谨慎、精益求精、永不自满。希望进一步做到兼收并蓄、择善而从、不断努力、勇于创新。

三

柏梁在过去多年研究悲剧的基础上集成、丰富和创新的《中外悲剧史论》从

书，大致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这是一套涵盖了世界上诸多戏剧大国在悲剧文学方面的发展概貌的通史类丛书。

悲剧艺术是戏剧当中最富于感染力和文学性的体式，她主要反映出人类在天灾人祸降临头上的誓死抗争，以及在这种抗争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此外还有崇高的行动和博大的品格。

正因为此，柏梁的悲剧史论系列研究具备一定的开拓意义。悲剧学问题本身很复杂，读者需要也较广泛，有关这一专题的学术研究也应该是千姿百态的。微观研究、断代研究和国别研究都非常重要。总要有人广采博纳，来做一些总体性较强的整合研究。

他的世界悲剧史溯源于古巴比伦、古埃及的文明萌芽形态，着重对古代希腊、罗马和印度的早期悲剧予以了浓墨重彩的勾勒，又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欧洲悲剧、13世纪以来的亚洲悲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描摹，并且在此前提之上作了一些归纳、比较和理论升华。对18世纪以来的近代悲剧，柏梁也作了大量的整理、阐释和分析工作。我过去曾对柏梁从事像世界悲剧文学发展这样大的课题表示过担心，因为这样的研究涉及的国家、地区和种族是那么多，语言的隔阂较大、材料亦难于足够掌握和充分占有。但在看到他的这些成果之后，觉得他是尽了大力，做出了成绩的。

其次，《中外悲剧史论》丛书将东方悲剧汇入了世界悲剧演进的主流。

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古希腊悲剧就已经发育得相当完善。相当一批悲剧家们拱卫着三大悲剧家的矗立，悲剧竞赛活动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典。由此衍生出来的西方悲剧蔚为大观，成为西方文艺中的重要部类。相形之下，东方戏剧是否有悲剧，这些悲剧是否正宗，以及东方悲剧在世界上是否也能占有一席位置，这是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悲剧只是西方的专利，东方没有正宗的悲剧，甚至连“悲剧”这一翻译用语是否准确都成为问题。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印度、中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确实有着自己的悲剧，这些悲剧必然带有浓厚的东方特色和民族性，但在总体上仍然可以同国际间通行的基本悲剧观念联接。

世纪初叶时，我国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明确指出，元代悲剧“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季思在世纪末叶选编的《中国十大古

典悲剧集》，也得到了学界和社会上大多数读者的基本认同。

柏梁在前人的基础上，不仅将西方悲剧的源头追溯到古老的东方悲剧文化，还将东方悲剧中的一些名家精品与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悲剧相互呼应。书中不仅是对东西方悲剧的简单排列，还注意到从全球悲剧发展的先后相承和彼此互补方面看问题。比方书中提到的为什么古希腊罗马悲剧几乎有千年后继乏力的光景，而在遥远的东方却接力赛跑般地出现了包含悲剧在内的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希腊悲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究竟有无文化上的血缘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值得人们深思。将东方悲剧如实归入世界上各国悲剧之列，能使一部世界悲剧发展史显得更为公允、扎实而客观。

第三，《中外悲剧史论》丛书的问世，可以促使人们思考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悲剧特色的问题。

本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否承认中国有悲剧，都对悲剧问题十分关注并充满了探讨热情。悲剧问题成为文艺理论课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1936年我在山东大学读大三时，就在叶石荪教授所讲《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程中听说到了悲剧问题。洪深教授曾让我做他排演《寄生草》的助手，也在谈话之中常提到这一类问题。尽管关于西方悲剧偏于严肃和崇高、东方戏剧缺少这些基调的说法不少，但这只是一部分西方学者及其赞成者们的观点。东方学者对东方悲剧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东西方文化本身存在着差异，古代悲剧的差异当然也很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差异可能会逐步减少乃至融合，这是今后可以预期到的趋势。如果说要求中国古典悲剧的标准和特点应与西方悲剧完全一样，那岂不是要求我们削足适履？

借鉴西方悲剧理论，联系我国戏剧实际情况来考虑中国悲剧问题，自觉地探讨悲剧的基本理论及其在戏曲解读过程中的具体运用，自觉地将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进行比较，自觉地在我国大量翻译并上演许多西方经典悲剧，这都是上个世纪才出现的新鲜事。中国的悲剧及其理论归纳不可能不具备浓厚的中国特色。在世界各国林林总总关于悲剧问题的不同思索中，中国的悲剧及其理论思考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挖掘、认真研究的学术文化问题。

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来，我国的学术文化环境有所改善，柏梁等一大批青年学者都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这是我国文化的一大转机，使得勤奋努力的学人们看到了光明前景，更加增添了前进的动力和信心。社会大环境的清朗平和，具体工作条件的改善和个人的自觉努力，以及具有高尚的理想与永不自满的品格，这些因素如能综合起来，就能为人才的涌现提供坚实的基础。衷心希望柏

梁能以已经取得的成绩作为基础，再接再厉、不惮艰辛，切切实实地为建立中国的悲剧史学科和戏剧文化学、共同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羊年新春

2003年2月3日

序

江曾培

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谢柏梁，近年来先后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两项科研课题，著成了《世界古典悲剧史》和《世界近代悲剧史》论稿。在专家评审鉴定会上，被一致认为是一项富有开拓性的研究。

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悲、喜剧之分，属西方传统的美学范畴。而中国古代戏曲的分类，一般以题材或角色行当而定。历代的文论和曲论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悲剧、喜剧的概念。本世纪初，在一些企图沟通中西方文化的学者中，曾引起中国有没有悲剧的争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争论后来未能深入展开。

80年代初，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编选《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时，曾组织全国的专家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将其中一些文字，结集为《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

在我国悲剧学开始勃兴的时期，谢柏梁先生以博大的视野，丰富的材料，对全球悲剧予以广阔的覆盖与全面的分析，从而把这一问题的研究系统地向前推进一步。它成了迄今为止第一部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在内的世界范围的悲剧史著作。

我曾有幸参加过谢柏梁博士作为国家社科项目的验收与鉴定工作。参加评审鉴定以后，我在想，那些认为悲剧只是西方概念，不能用以衡量中国戏曲的看法，似乎忽视了人类与人类文化有着许多共同的、相通的地方。谢柏梁在书中写道：“文明之源的根本动力，是对生命、社会和宇宙的不断探索。求索过程中美好愿望与严峻现实的必然反差，构成了人类生存状态中饱含生机的危机。”这就使得人类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具有悲剧性的冲突。中国古典戏曲《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等，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冲突。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

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就可以成为衡量古今中外一切悲剧作品的共同尺度。因此，对这个具有人类普泛性的悲剧概念，就不必拒绝借鉴，应以“求同”的心态，“拿来”为我所用。

当然，不同国家的文化，又有着自己特有的发展轨迹。悲剧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虽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它毕竟是从西方的戏剧创作与演出中总结出来的，其具体内容与阐述，就难于完全适用于东方，适用于中国。比如，西方悲剧的主角一般都是帝王将相，我国悲剧的主角则大多系普通百姓。对此，就不宜用西方的悲剧学说生搬硬套，而应从中国社会的、文化的实际状况出发，研究出中国悲剧的特征与特色。在这里，我们就又不能满足于“求同”，而应该进而“求异”。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谢柏梁先生研究的可贵，也在于他对东西方悲剧作了认真的对照与比较，探索了它们的“同”中之“异”。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悲剧学，做出了有意义的拓荒实绩。

2003年元月

目 录

《红尘悲音》总序	徐中玉 (1)
序	江曾培 (1)
绪论：近代悲剧与世界悲剧	(1)
一、关于近现代悲剧的学术争辩	(1)
二、从地域与种族文化看近代悲剧	(5)
三、悲剧美学的包容与延伸	(9)
四、世界近代悲剧的定义与特征	(12)
第一章 西欧近代悲剧之光	(18)
第一节 英国、爱尔兰与荷兰的悲剧	(18)
第二节 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的悲剧	(23)
第三节 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悲剧创作	(30)
第四节 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悲剧	(35)
第二章 歌德与《浮士德》	(43)
第一节 八十四载勤创造 三万余天苦追求	(43)

第二节 多才多艺多创造 有意有情有收成	(47)
第三节 历史悲剧慷慨悲壮 古典悲剧烦恼伤心	(50)
第四节 众手铸成《浮士德》 万千气象此登临	(55)
第五节 五重悲剧悬日月 一生追求写春秋	(58)
第三章 席勒的悲剧创作	(67)
第一节 个人与家庭之渊源 人生与时代之互动	(67)
第二节 早期悲剧狂飙卷动 青年时代意气飞扬	(71)
第三节 后期悲剧沉郁悲愤 人至中年民族情浓	(78)
第四章 雨果与法国近代悲剧	(85)
第一节 法国悲剧传统与启蒙主义悲剧	(85)
第二节 雨果 浪漫主义悲剧大师	(88)
第三节 雨果之后的法国悲剧	(93)
第五章 东欧悲剧的涛声起落	(99)
第一节 波兰悲剧的前前后后	(100)
第二节 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剧创作	(112)
第三节 匈牙利的悲剧检点	(118)
第四节 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的悲剧	(122)
第五节 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悲剧	(129)
第六章 大器晚成的俄苏悲剧	(136)
第一节 俄罗斯悲怨文化传统	(136)
第二节 俄罗斯早期悲剧发展的基本框架	(141)
第三节 19世纪的俄罗斯著名悲剧家	(146)
第四节 20世纪的俄苏悲剧	(159)

目 录

第七章 新大陆四国的悲剧鸟瞰	(169)
第一节 澳洲悲剧一瞥	(169)
第二节 加拿大悲剧观察	(175)
第三节 美国悲剧回顾	(181)
第八章 美国民族悲剧之父奥尼尔	(187)
第一节 奥尼尔的悲剧人格建构	(187)
第二节 奥尼尔的早期悲剧	(190)
第三节 奥尼尔的现实主义悲剧	(194)
第四节 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悲剧	(196)
第五节 奥尼尔的历史哲学悲剧	(200)
第六节 奥尼尔与美国戏剧	(212)
第九章 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三大悲剧家	(215)
第一节 田纳西·威廉斯的病态与欲望悲剧	(215)
第二节 阿瑟·米勒的社会问题悲剧	(221)
第三节 威廉·英奇的日常挫折悲剧	(228)
第十章 亚洲近代悲剧之花	(232)
第一节 东亚近代悲剧	(233)
第二节 东南亚国家的悲剧	(241)
第三节 南亚近代悲剧	(244)
第四节 西亚近代悲剧	(248)
第十一章 中国近现代戏曲悲剧	(251)
第一节 近代悲剧源流	(251)
第二节 20世纪中叶的悲剧建树	(255)

第三节	20世纪末叶的悲剧开拓	(263)
第十二章 中国话剧悲剧历程		(278)
第一节	中国话剧悲剧源流	(278)
第二节	郭沫若、老舍与田汉的悲剧	(282)
第三节	20世纪末叶的著名悲剧	(287)
第十三章 曹禺：20世纪的中国悲剧大师		(294)
第一节	悲剧创作中的生命追求	(295)
第二节	摧枯拉朽的《雷雨》	(298)
第三节	《日出》《原野》上 《北京人》之《家》	(302)
第十四章 杨彬的《清宫外史》三部曲		(310)
第一节	悲剧冲突论	(311)
第二节	悲剧人物论	(313)
第三节	悲剧史诗论	(325)
第十五章 近现代东西方的悲剧理论		(331)
第一节	东方悲剧观念的形成与强化	(331)
第二节	伏尔泰、莱辛、席勒与黑格尔的悲剧美学	(335)
第三节	叔本华与尼采的唯意志论悲剧说	(339)
第四节	批判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	(341)
第五节	弗洛伊德与其他学派的悲剧学说	(344)
后记		(349)